

辨失真之本，察译事之难

——释道安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的译史范式与影响

马楠

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，中国·甘肃 兰州 730070

【摘要】东晋高僧释道安提出的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，是中国翻译史上首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。这一理论精准点明梵汉翻译里语序改动、文风修饰、冗余删减等难以避免的形式损耗，也道出时代隔阂、认知差异、译者自身局限带来的翻译根本难题。该理论为中国翻译规范意识筑牢根基：一是给佛经译场提供实践方法，催生彦琮“八备”、玄奘“五不翻”等后续译论；二是搭建起“忠实与通顺”“可译性与译者主体性”等核心讨论框架，深刻影响严复“信达雅”译学体系；三是揭示翻译活动自带的永恒矛盾，理论阐释力突破宗教文本范畴，成为适用于科技、西学等领域的通用理论范式。研究证实，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不只是中国首套系统翻译规范，更凭借对“失真”与“译难”的辩证思考，持续推动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发展。

【关键词】释道安；五失本；三不易；佛经翻译

引言

中国翻译史的核心探讨，始终围绕语言转换的精准度、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以及理论发展的系统性展开。佛经翻译作为中国早期成规模的翻译实践，其理论探索为中国翻译史打下重要根基。东晋释道安提出的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，深刻剖析了佛经翻译中语序调整、文质取舍、内容详略处理的内在规律，也点明时代变化、读者认知差异、译者素养水平带来的外部挑战。这一理论兼具前瞻性与深刻性，是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。本文将解析该理论的内涵与诞生背景，评估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价值与影响，进而梳理翻译理论的传承与演变脉络。

1 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的内涵与历史语境

释道安是东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佛学家、佛经翻译组织者与翻译理论家。在长期的佛学研究及译经实践中，他深刻意识到，早期佛经翻译因缺乏统一标准与理论指导，导致译文质量良莠不齐，部分译文或因过度拘泥原文而晦涩难懂，或因过度追求文饰而偏离本义，严重影响佛教义理的准确传播。为改变这一局面，道安亲自主持译场，规范译经流程，对译文的准确性、可读性提出严格要求。公元383年，道安在《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》中提出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理论。这一理论的出现，意味着中国翻译思想第一次脱离零散感悟与经验总结，上升为具有逻辑层次、适用范围与评判标准的系统化理论。他意识到翻译并非简单的语符替换，而是在语言、文化、时代多重约

束下的选择性调适，任何翻译都必然面临“失”与“不失”、“质”与“文”的矛盾。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正是对这些矛盾的理论化回应，它既承认翻译中形式损耗的必然性，又坚守意义忠实的底线，为译者提供了清晰可行的实践准则。

1.1 “五失本”疏解

“译胡为秦，有五失本也”，道安以“失本”概括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形式偏离，同时明确界定“失”的边界，强调意义层面的忠实不可动摇。“五失本”依次对应语序、文风和详略三个层面的翻译调适，构成完整的操作规范体系。

其一，语序调整之失。“胡语尽倒，而使从秦，一失本也”。梵文语法与汉语存在结构性差异，多使用倒装、后置等句式，而汉语以顺装、意合为基本特征。若完全保留原文句式，译文将佶屈聱牙、难以理解。道安在译经实践中明确坚持“时改倒句，余尽实录”，将语序调适视为翻译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（释僧祐，1995）。钱钟书（2008）对此评价极高，认为此类“失本”是翻译的内在要求，“本有非失不可者，此本不失，便不成翻译”。道安对语序问题的处理，触及了翻译的基本规律，即语言形式必须服从目的语的表达习惯。

其二，文质风格之失。“胡经尚质，秦人好文，传可众心，非文不合，斯二失本也”。梵文佛典原典语言质朴、少事雕饰，而汉地文化传统崇尚文辞优美、音韵和谐，读

者对文本的审美要求较高。为使译文被受众接受，译者必须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适度文饰。道安并非简单偏向“质”或“文”，而是提出了文本类型差异化策略：戒律、毗昙等典籍要求一字不易、严守质朴；大乘经典则可适度润色，在忠实与通达之间寻求平衡（马祖毅，2004）。这种文质观体现出高度的实践理性，超越了此前非质即文的片面争论。

其三至其五，冗繁删削之失。三者均指向原文重复、赘语、回环等表达的合理裁汰：三失本是删去经文咏叹中多层复述的语句；四失本是删去文辞相近、意义重复的“义说”部分；五失本是删去另起话题时对前文内容的重复腾挪。道安明确划定删节范围，仅允许对冗余内容进行删改，严禁对核心义理、关键概念、重要文句进行删改，尤其强调戒律翻译“一言乖本，有逐无赦”，体现出极为严谨的忠实立场（释僧祐，1995）。这一规则既保证译文简洁流畅，又最大限度维护原文意义完整性，为翻译中的详略处理提供了稳定标准。

1.2 “三不易”疏解

如果说“五失本”是对翻译操作层面规律的总结，那么“三不易”则是对翻译本质困境的哲学反思。道安首次将翻译之难系统化，从时代、受众、译者三个维度揭示翻译无法超越的限制。

第一，时代语境之不易：佛陀立言因时而立，时俗变迁、语言流变导致古典言辞难以适应当世，译者必须删雅古、调文风以合今时，这是由历史变迁带来的客观困难。第二，受众认知之不易：圣智与凡俗之间存在巨大认知差距，以千年之前的微言大义，传递给后世普通读者，既要保持本义，又要通俗易懂，难度极大。第三，译者主体之不易：去圣久远，文献散佚，后人以近世心意揣度古义，难以达到阿罗汉等高僧那般审慎精严，译者的学识、理解、态度直接影响译文质量（梁启超，2005）。

“三不易”将翻译困境从技术层面提升到认识论层面，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问题，更是历史问题、文化问题与主体问题。这一思考深度，使道安的理论远超同时代的经验总结，具备了持久的理论生命力。

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完整、系统、具有操作性的翻译理论。它首次清晰区分了翻译中的“形式损失”与“意义忠实”，平衡了“源语导向”

与“目的语导向”，建立了可遵循的规范体系与评判尺度。钱钟书（2008）在《管锥编》中高度评价：“论‘译梵为秦’，有‘五失本’‘三不易’，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，首推此篇”。该理论不仅为当时译场提供纲领，更为后世译学确立了问题意识与规范意识，成为中国传统译论不可替代的范式源头。

2 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的范式建构与持续影响

2.1 对译场实践与早期译论的规范引领

道安理论提出后，迅速成为佛经翻译的指导性纲领，对鸠摩罗什、玄奘等大型译场的实践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，推动中国佛经翻译进入规范化、专业化阶段。

首先，强化翻译规范意识。道安理论使译者明确认识到，翻译不是随意的语符转换，而是承载文化使命、必须恪守准则的严谨工作。译者开始自觉平衡忠实与通顺、形式与意义，译场分工、审校、润色等流程更加完善（马祖毅，2004）。其次，确立质派理论支柱。道安以意义忠实为核心，抑制过度文饰与随意归化，推动形成以直译为主、意译为辅的传统，为“质派”翻译奠定坚实理论基础。最后，提升译本整体质量。道安理论提供了清晰的评判标尺，促使译者在语序、文饰、删节等环节精细处理，在忠实与流畅之间达成最优平衡，后世玄奘译本之所以达到“圆满调和”的境界，正是对道安思想的继承与升华（冯全功，2022）。

在理论层面，道安学说成为后世佛经译论的思想基石。彦琮在《辩正论》中提出“八备”说，将译者的信仰、德行、学识、语言能力、耐心勤勉等八项条件系统化，正是对“三不易”中译者素养要求的深化与拓展（王秉钦，2018）。玄奘提出的“五不翻”原则，针对多义、神秘、无对应、顺古等术语采用音译保留，与道安“五失本”形成完美互补：道安说明哪些形式可以“失”，玄奘说明哪些形式不可“失”，二者共同构建起中国古典翻译应对“可译性”与“不可译性”的完整策略体系（冯全功，2022）。

2.2 对传统译论话语体系的范式塑造

道安理论最大的贡献之一，是确立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议题与话语框架，使中国译学形成稳定的问题域与表达方式。第一，奠定“忠实与通顺”的核心矛盾。道安既承认“失本”的必然性，又坚守“不失义”的底线，这一

辩证关系成为此后千余年中国译论的中心线索，所有翻译争论均围绕这一矛盾展开。第二，提供经典概念与术语。

“失本”“不易”“文质”等概念，成为描述翻译现象、总结翻译规律的标准表述，为后世理论提供了稳定的话语工具。第三，开启多元议题探讨。道安对文本类型、受众差异、译者素养、文化适配的关注，开启了中国译论对译者主体性、翻译规范等问题的持续探索，形成极具本土特色的思维范式。

随着历史发展，道安理论的影响力超越宗教翻译，广泛渗透到科技翻译、文学翻译与西学翻译之中。明清之际，西方科技传入中国，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翻译《几何原本》等科学著作，坚持“译名以原意为宗”，强调概念准确、表述严谨，与道安“不失本义”的立场一脉相承（马祖毅，2007）。近现代西学东渐，严复提出影响百年的“信达雅”标准，其内核与道安高度契合，“信”对应道安对意义忠实的追求，“达”对应为通顺而做的必要调适，“雅”对应文风审美与接受度考量，显示出道安思想对近代译学的深层影响（王秉钦，2018）。

2.3 对现当代翻译研究的本土理论启示

在西方翻译理论大量引入的背景下，道安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本土价值，为现当代翻译研究提供重要启示。首先，揭示翻译的永恒本质矛盾。道安指出，语言文化差异必然带来形式损耗，而译者必须在限制中实现意义传递与文化转化，这一判断与当代翻译研究中的“创造性转换”“不确定性”等核心命题高度契合，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洞察力（祝朝伟，2006）。其次，提供中国翻译规范研究的早期范本。道安对操作规则、文本类型、受众、译者责任的综合思考，早于西方翻译规范理论，为构建中国特色译学话语体系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源与本土范例（马祖毅，2007）。最后，蕴含译者主体性的先驱思想。道安高度强调译者的学识、态度、判断力对翻译结果的决定性作用，将译者从被动的“传声筒”转变为主动的“阐释者”，为当代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本土思想源头（马祖毅，2007）。道安理论不仅属于古代，更属于现代与未来，它以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翻译最根本的规律，是中国对世界译学思想的独特贡献。

3 结语

释道安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是中国翻译史上首次系统

阐释翻译规范的标志性观点，核心价值在于辩证点明翻译活动必然存在的形式损耗与内在困境。它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从经验感悟走向理论自觉，更深度影响了后世译学的发展方向。实践层面，它为佛经翻译确立了清晰的操作准则；理论层面，为后世译论搭建了核心议题基础；话语层面，构建了以“文质”“得失”为核心的概念体系；范畴层面，其核心原则延伸至科技、西学翻译等领域。纵观其历史地位，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堪称中国译学思想的源头与枢纽，为译者理解翻译本质提供了长久的思想参考。本研究重点剖析了该理论的核心内涵与宏观历史意义，后续可进一步探究其理论演变与具体实践应用，从历时角度深化对翻译复杂性的认知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常红星. 释道安译经“失本”态度问题补证[J]. 中国翻译, 2021, 42(01): 41-47+190-191.
- [2] 冯全功. 从概念史纵观中国翻译策略话语的历时演变[J]. 民族翻译, 2022, (03): 44-53.
- [3] 罗铮. 道安译论的文化传播内涵及现实意义[J]. 语言与翻译, 2016, (04): 67-72.
- [4] 钱钟书. 管锥编[M]. 上海: 三联书店出版社, 2008: 1262.
- [5] 释彦琮. 辩证论[C] // 释慧皎. 高僧传合集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1: 118.
- [6] 朱志瑜, 朱晓农. 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[M]. 北京: 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06.
- [7] 梁启超. 翻译文学与佛典[C] // 佛学研究十八篇. 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5: 145.
- [8] 马祖毅. 中国翻译简史: “五四”以前部分[M]. 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4.
- [9] 王文颜. 佛典汉译之研究[M]. 台北: 天华出版公司, 1984: 206.
- [10] 释僧祐. 出三藏记集[M]. 苏晋仁等, 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5.
- [11] 王秉钦.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[M]. 天津: 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18.
- [12] 祝朝伟. 传事以尽, 尚质而无斲凿; 委本从圣, 求真勿令有失——道安“五失本、三不易”说源流考及现代诠释[J].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, 2006, (06): 112-116.